

## 六、“红教”与“黄教”之争

从十五世纪起，西藏的历史就围绕着一个新的政权的命运而演变，这个政权非常迅速地兴起，注定要逐步改变西藏的政治面貌。我这里指的是格鲁派（dGe lugs pa）。在几年内，格鲁派僧人遍布全部前藏，在前藏，甘丹寺（dGa ldan）建立于1409年，哲蚌寺（aBras spuns）建立于1416年，色拉寺（Se ra）建立于1419年。他们还伸展到后藏，在1447年建立札什伦布寺（Tashilunpo），还派出前哨远及喀木（康，Kams），在喀木的极边上1437年建立了昌都寺。

这样，从十五世纪开头的几年，西藏历史的重心不再是对立家族间的斗争，这些家族现在精疲力竭，数目也减少了。西藏的历史的中心转移到后藏贵族支持的红帽噶玛派（Kar ma pa）与经过巧妙策划联合贵族订立联盟的黄帽格鲁派之间的对立。从这时起，西藏发生的事件就同黄教的最伟大的人物，精确地说，同前五辈达赖喇嘛们密不可分，因为在这个时期他们个个确实是出现在西藏历史的朦胧的地平线上的高大的人物。因此我们看到的史料里充斥着关于他们的记载。虽然这些记载把达赖喇嘛突出地描写，相形之下，其他人物似乎晦暗无光，无足轻重，但这不应使我们看不到达赖喇嘛的一些对手的高贵品格，这些人不屈服于失败，一直为信仰和独立奋斗到底。

黄教的扩张势力和在人们精神上进行迅速的征服，惹起

对立教派的猜疑；于是，如松巴堪布所说，噶玛派在黄教派的据点哲蚌寺和色拉寺的旁边建立了两所寺院，一所是黑帽派，一所是红帽派，用来威胁和对抗黄教。后来藏巴汗又在札什伦布寺后面建筑了一座碉堡神殿（temple—fortress）。战争爆发后，许多离主寺较远的黄教寺院被迫改变信仰，随了红帽派。

红帽派采取一项更严厉的措施，在拉萨（稍后这地方注定要繁荣昌盛，当时虽然还没有到达这一顶峰，却已因人们缅怀吐蕃赞普即西藏最高保护神的凡世化身而被尊重为圣地）禁止色拉寺和哲蚌寺的喇嘛参加规模巨大的新年法会，从1498年始，直到1518年。拉萨不准格鲁派僧人进入；当时内邬栋已无权过问拉萨，拉萨已隶属于后藏诸侯，他们是红帽派的公开的后台，从桑主孜的宫殿里以充满疑妬的眼光注视着黄教的扩张活动。

在根敦嘉错（dGe ʼdun rgya mts'o, 1475—1542）即正统传说所的第二世达赖喇嘛在位期间，红黄教之争公开化了，甘丹、色拉、哲蚌三大寺已发展到威胁噶玛派的地步，斗争在新年的传召大会（sMon lam）上爆发了。传召是宗喀巴（Tson ka pa）所创立的一种法会，每年在拉萨举行。自从创始以来，依照传统，法会应该由哲蚌寺的住持主持，可是1498年仁蚌家（Rin spuṅs）占据机学（Skyid šod）<sup>(81)</sup>以后，主持大会的权利就转入桑浦寺（gSan pu）和噶玛派之手。噶玛派继续主持这个法会，直到1517年（火牛年）。那么1517年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在衮玛阿季王札失札巴（Gon ma ʼNag gi dbaṅ bKra šis grags pa）的一次胜利的战役之后，仁蚌家的势力明显地削弱，这一

胜利粉碎了仁蚌家阿旺南杰 (Nag dbaṅ rnam rgyal) 的阴谋，恢复了帕竹的威望。这个假设甚至用《年表》(Reu mig) 里的点滴资料也可以证实，《年表》简单地说，从铁鼠年 (1507年) (82) 以来，仁蚌家的权威开始下坠，格鲁派，更确切地说哲蚌寺的住持，威望大增。于是恢复旧例法会，由创设它的教派主持。大衮玛 (Goṅ ma chen po) —— 他已为其家族增添显赫的声名，宣称有权过问西藏的政治生活——对这事给予了认可。

这样黄教僧人再度回到拉萨，传召法会再次交给他们主办，他们可以用华美耀目的排场庆贺他们再新的光荣了。

各个教派都争夺这个法会的主持权，这不仅仅考虑法会的宗教意义，也是因为谁主办这个法会，谁的威信就会增加。黄教派从来没有完全放弃它，因为这个法会是最确实的证据证明黄教的祖师有幸运倡办并曾讲道于此。这样，传召的恢复也同一种新的政治形势相吻合，再次表明，正当仁蚌家对噶玛派亦步亦趋、与之共命之时，黄教派得到了帕木竹巴的支持。虽然帕木竹巴衰宗陵替，但仍然代表着西藏的最高权力 (83)，仍然有武力足可以抵抗任何想统治黄教僧人的尝试。

传召法会在1517年恢复举行，当时有一千五百名哲蚌寺喇嘛和三百名色拉寺喇嘛参加，这说明在哲蚌寺和前藏一般都更趋和平安定了。在格鲁派主持法会权利被夺走的年代里，格鲁派的处境是很困难的，这可以由根敦嘉错这些年内不住在哲蚌寺内来证明，他在1498年机学的战斗爆发后就离开了自己的寺院，1517年在拉里 (Lha ri) 的协敖 (Zal sṅo) 和哲蚌寺的机索 (Spyi so) 的迎请下才回到寺中。

1498年,天际微阴,根敦嘉错就避难去沃卡( 'Ol ka),这地方的王子们从黄教建立者在世时就坚定地信奉黄教;那时宗喀巴接受了沃卡的屡次邀请。当宗喀巴停留在精齐(rD sin p'yi, 或ji)寺时,他重塑了噶米云丹雍仲(Gar mi yon tan gyun' druñ)所立的该寺所敬奉的觉卧(Jo bo)佛像,还重绘了画象。这些壁画年久漫漶,他叫人把壁画按照他人定时经常见到的诸神形相重新画过<sup>(84)</sup>。

根敦嘉错已经在前、后藏访问了一些地方,如:精齐(在沃卡)、甲日宗(Gya ri rdson)、业尔巴(Yer pa)、热振(Rva greñs)、喀浦(Ka pu)、喀木陇(K'am luñ)、波多(po to)、乃乌苏尔(sNeu zur)、曲米沙巴(C'u mig gsar pa)、拉甲里(甲日, Lhag rgya ri)、穷结(a'pyon rgyas)、朗浦(GLañ pu)、叶(E)、日乌甘丹(Ri bo dga ldan)、甲域(Bya yul)、达波(Drags po)、甲美托塘(rGyal me t'og tan)。他远到后藏,到过札什仑布、博东叶(Po don e)、纳塘(sNar t'añ),乃宁(gNa<sup>s</sup> rñin),夏鲁(Za Lu)、白科尔曲代(dpal a'K'or c'os sde)(江孜)、钟则(aBron rtse)、绰浦(K'ro p'u)。除了一次短暂的停留,他再也没有回到哲蚌寺。他的离职出走开始于主持传召法会权力的被剥夺,结束于哲蚌寺恢复了主持法会的地位,其动机不纯然在于说教。他的出走时间适逢这些事件的发生,而且拖的相当长久,无可怀疑必定有一些更深刻的原因,这就是在前藏政治权力仍然在桑主孜的摄政者们的掌握之内,以及由此拉萨当地红教受到这些摄政者的优待。



根敦嘉措 (dGe 'adun rgya mtso), 后世尊称为达赖二世, 当时不过是黄教的精神领袖和黄教寺院的主要的主持人, 不像红帽派直接得到后藏势家和大多数贵族的支持, 他必得一步一步地惨淡经营争取合适的支持者; 在这方面不成功, 他就必须取代世俗政权 (在帕木竹巴衰微时政权无人作主) 并且诱导黄教抢先转换方向, 以便恢复在前藏的势力, 同时为自己教派保证的一个优越的地位。

通过这样行动, 黄教必然代替了一个已经不能掌握自己命运的贵族政体。这件工作费时既久而且困难很多, 到了达赖三世即位, 黄教已经摆脱了阻碍, 交上了好运。

达赖三世锁南嘉措 (bSod nams rgya mts'o) 于1543年 (水兔年)<sup>(85)</sup> 出生于前藏的机学, 准确地说就是堆龙 (sTod lun) 的孜喀康萨宫 (rTse k'a k'an gsar gon) (传记p.10a)。他的家庭自诩是 玛仁钦乔 (rMa rin c'en c'og) 的后裔, 玛仁钦却是萨梅 (Sad mi) 七人即藏族最早出家的七人之一。这个家族在元朝划分十三万户时属于甲玛万户 (rGya ma); 祖先们在萨迦时代曾任显职, 到帕竹时代仍然如此; 后来被任命为杰钦孜 (rGyal c'en rtse) 的宗本 (传记p.10a)。

他的父亲是第巴南杰札巴 (sDe pa rNam rgyal grags pa), 母亲叫贝觉布墀 (dPal 'jom bu k'rid), 是帕竹的管寺人咒师汪秋仁波且贡桑孜 (dBaṅ p'yug rin po c'e Kun bzaṅ rtse) 的女儿。

我们不知道在什么机缘和预谋之下, 这个孩子被认为根敦嘉措的转世; 他的传记是达赖五世写的, 传记说, 他是由一个转世喇嘛确定的 (传记p.15a); 寻认发生在1544年; 后

来由胡图克图锁南札巴 (bSod nams grags pa) 予以承认。锁南札巴照顾了他的幼年生活，在黄教的此后的命运上关系颇大，于是，他被认为是哲蚌寺法王的转世（传记p. 17 c）。换句话说，在格鲁派早期，这个教派的发展，同其最大寺院哲蚌寺是分不开的。

锁南嘉措的一生中的个人活动，如进入哲蚌寺、剃发、受戒、学经、幻现奇蹟等，并不使我们感到兴趣。我们倒愿意把那些轻信传记家们所详细描写的宗教事件和宗教体验推荐给研究西藏圣书的人们<sup>(86)</sup>。不过，我认为，就连这些学者也终于感到得不偿失，因为他们会屡屡发现一模一样的格式和传说的反复记述，这恰好是一切西藏传记 (rNam tar) 的永恒的内容。如果有人出于好奇心，想对此有一个概念，他可以在舒勒曼 (Schulemann) 的《达赖喇嘛传》中找到一个提要，在原材料如我们经常引用的《蒙古源流》、济美多吉《蒙古喇嘛教史》里，那记载的就更多了。

让我们利用达赖五世这位宗教传记家提供的寥寥无几的线索来试着重新塑出：当时在西藏正在发生着的事件、教派之间的磨擦、新思潮对于旧思潮的冲击、内部的派别分裂以及在这样动乱的背景下黄教的活动，它取得甚么进展、它如何得势、如何愈来愈被迫同蒙古人缔结同盟。我们不必惊讶：那些旧教派，噶玛、萨迦、噶举开始起了疑心，后来采取了仇视态度。面对宗喀巴的继承人的这一极其迅速的进展，黄教在几年间传布到各地，在人民中找到热烈的拥护者，旧教派再也不能无动于衷。

黄教这样迅速的走运，理由并不难看出。任何新的思想或新的制度诞生时都一样，黄教也不例外地表现出一种活动

能力和一种宗教的热忱，而这二者在其他教派中已经完全消失了；这些教派只依靠追随他们的人们。自以为了无一失，他们享受着诚心信奉的保护人的恩惠；凭依百年的传统，一味依赖虔诚的有势力的世家的支持；他们落后保守，怀疑任何一种新事物，懒洋洋地陶醉于自我满足之中。

另一方面，格鲁派在宗喀巴以及宗喀巴第一代的门徒的说教的鼓舞下吸引了群众。这些门徒以同样的热忱献身于净化宗风的事业，不因其他教派的反对而气沮反而受到激励而精进。在域内遍处，人们都被这新的观念所吸引。西藏人愉快地看到教派的僵硬的形式主义和腐败的僧侣生活，受到新生活的波涛和健康的思潮的冲击正在动摇，因此他们满怀希望，一心相信格鲁派的本尊(yi dam)耶歇袞波(Ye ses gon po)亦即格鲁派和西藏的保护神的显灵的宣传。

面对黄教如此幸运，旧教派暴露的恶意，是自然的；他们本来可以表现得更好些以改善受尘世财富的牵连而低落的现实地位，以涤清因过分贪恋入世在心灵上的污染。这些心灵上的尘垢已经使他们背弃了祖师们的真诚的愿望。

寺院的戒律慢慢松弛了，大部分喇嘛都结了婚，过着懒散的生活，清贫和禁欲成为空洞的字眼。在主要的教派中，寺院落入王族手中，因而宗教的神圣职务不是传给最有资格的人而是传给子姪，成了一种世袭的权利。宗喀巴重申了戒律的严肃性：他同其弟子在教理上恢复转世原则，这样就便于选择一个身家清白的儿童并保证给予严格的周到的教育。

进展非常迅速，甚至在后藏的腹心，当锁南嘉措访问江孜时，他发现格鲁派已经在当地广泛传播，而江孜过去是萨迦派的重要卫城之一。由于时势的升沉，战争的频仍，人类设

施的易朽，旧教派衰微了，旧教派的靠山的权力也垮了，经过战火和抢劫的破坏，寺庙荒芜了。而格鲁派随时接收占领别的教派放弃的地方，恢复破烂的寺院，在别的教派僧侣丢掉的神龛中举行自己的宗教仪式。达赖二世和达赖三世就是从这种动机出发搞传教的。当锁南嘉措还年幼时就被旁人带着在后藏从一地到一地；在成年学成后，不但远赴山南(Lho洛，前藏的南部地区，以后还要提到)，而且经过前藏到四面八方去旅行，他访问寺院，接受朝拜，给寺院和佛像开光、讲道和祝福。达赖五世据真实的文献写的逐年记载着大事的锁南嘉措传，记录着他的行程<sup>(87)</sup>。虽然达赖五世只关心他的前辈的宗教事蹟而忽略政治事件，或者当政治事件可以阐明锁南嘉措的圣洁和道德的形象时，略微提它几句，然而从锁南嘉措受延请待如上宾的这些旅行的简短记述中，我们看到，当时西藏已分裂为许多领地，各自依着短暂的动摇不定的友谊关系、臣附关系或血缘关系而成立。大致可以说每个地区都有自己的头人，享有完全的自治并努力保持独立，向或此或彼的强隣和企图领导全藏的寺院寻找支持。这些头人有种种头衔，或称为王(rgyal po)、或称第巴、或称萨均(sa skyon)、囊索(nan so)、沽尚(sku žan)，有时只叫作雪仲(žabs druṅ)<sup>(88)</sup>。

这些王侯中的若干人似乎集拢到黄教的周围，支持黄教的目标，在某种意义下成为它的保护人；这些是泽当(rTse t'an)、贡噶(Gon dkar)、甲日(rGya ri)，他们都是帕木竹巴的旁系，后来在俺答汗(Altan Khan)会晤锁南嘉措时也给他们送了礼品。还有沃卡诸侯，从传记中看来是黄教的坚决的拥护者。



帕木竹巴这时仍然是这些贵族的最高领袖，但仅保有一个盛时实力的影子而已；在仁蚌家族式微后，天际已经升起后藏新王的幸运的群星；内邬栋仍然坚持它西藏首都的称号<sup>(89)</sup>；实际上这是一句空话，因为事情已经走上一个完全不同的路途。真实的首都已经被阿王札巴（*Nag dbaṅ grags pa*）转移到贡日噶波（*Gon ri dkar po*）；他在这里安下了驻所并且同锁南嘉错和格鲁巴缔结了真诚的友谊，这也恰是他的家族的古老的传统的继承和发展。

《噶当教法史》（*dGa' ldan c'os ábyuñ*）如实地说，帕木竹巴和宗喀巴是两种教旨（*bsTan pa gñis*）；但他们精神是一致的（*Srog gcig*）；我们知道：宗喀巴本人曾经是帕木竹巴派的却细巴（*C'os bži pa*）的弟子。

由辛厦才旦多吉（*žin bšag Ts'e brtan rdo rje*）建立的后藏政权，利用内邬栋政权的衰落，不断扩大势力；后藏的统治者们因为与红帽派有共同的政策，联合一起，差不多结成真正的联盟，在红帽派的支持下力量更加强大，因此内邬栋为了自卫，寻求格鲁派的帮助，在格鲁派的暴发户的卵翼下恢复元气，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了。不久，发生了严重了分歧，接着出现了试图用武力推翻格鲁派的斗争，这时，红帽派和它支持者们并不是孤立的，他们在一个在我们所重塑的历史初期权力曾达到顶峰、而后被更幸运的敌对派弄得声名黯淡的教派中得到同盟者，这个教派就是止贡巴；止贡派和红帽派一样同属于密宗传承，从同样的神秘的显示中取得灵感，承认共同的印度的或西藏的祖师。1537年，乘着根敦嘉措不在哲蚌寺，他们的军队推进到贡（*Koñ*），但到达沃卡时——当时仍然效忠于黄教——被沃卡的敦悦（*Don*

yod)强迫退到竹达(Gru mda'), 没有达到他们毁掉甘丹的目的就返回了。可是他们还从格鲁巴抢走了十八所寺院, 强迫这些寺院改宗<sup>(90)</sup>。

纵观达赖五世的富于启迪性教诫的记述, 我们时时听到战乱的回声。事实确是如此: 西藏在那些年月里非常动乱不安。战火就在黄教的主要堡垒之一的甘丹的门外蔓延。甘丹的贵族们从黄教一出现就给予支持, 逐渐变成了黄教的保护者, 这也许是甘丹寺距离他们的城寨很近, 并且受共同利益所驱使的缘故。甘丹对帕木竹巴的真诚的友谊也从未破裂; 自从1481年仁蚌的敦悦多吉被〔甘丹〕南喀杰波(Nam mka rgyal po)打退后, 这个友谊几度证实极有价值。南喀杰波札的帮助使大衮玛即阿王札失札巴, 也极铭感, 曾授予南喀杰波以内邬栋宗本和同地执法大臣的职位。正好在锁南嘉措时代出现过这样一个插曲: 当〔甘丹〕囊索敦朱杰波(Na nso Don grub rgyal po)侵入觉摩陇(sKyor mo luñ)时, 因为前此这地方已经由衮玛阿王札失封给雅郊(Yar rgyab)所以酝酿并激起极大的愤恨, 1553年发生公开的战争, 延长一年多, 战事的激烈竟使拉萨每年例办的法事也无法进行。

根据达赖五世写的传记, 锁南嘉措不管他周围的僧侣们搞些什么阴谋, 似乎总是抱着企求和平的态度。由于他享有很高度的宗教威望, 他时常被斗争的双方请出来进行调解, 平息争执, 劝说释憾修好; 1547年即有一例, 当年雅陇发生动乱, 因锁南嘉措年纪还小, 在穷结酋长们的敦促下, 由摄政出面仲裁<sup>(91)</sup>。

但是, 政治局势中的这些变动, 旧秩序的瓦解, 新的利

益和新的政治经济团体的出现，向那些希望保持长期和平的人们预示着不吉祥的未来。

1563年（传记·p.28），西藏又发生了武装斗争，这回是帕木竹巴内讧，一方以衮玛阿王札失札巴为首；另一方是他的孙子阿王札巴坚参（*Ṣag dbaṅ grags pa rgyal mts'an*）向他争夺权力。后者建立都城于贡日噶波，反对他的顽固的祖父。这一次甘丹王子敦朱杰波支持孙子这边（这个孩子同情锁南嘉错和格鲁巴，因此达赖五世把他描写得更好些，而从所叙述的事情来看，他实际上是个反叛者）。不管什么理由，这些失和引起很多反应，把西藏再次捲入战争，这场战争结果是：帕木竹的老的一房陷于更加衰败的境地，而甘丹巴的权力扩大了，不久就征服了堆陇（*sTod lun*）。

在这种情况下，甘丹寺的住持、甘丹池巴（*dGa' ldan kri pa*）以及格来桑波（*dGe legs bzaṅ po*），还有止贡、达陇、帕木竹巴、沃卡、堆陇和德庆（*bDe cen*）的贵族（p.72b）都出来调停求得协议，但没有成功。根据达赖三世传记作者所记，直到甘丹王子扩大了地盘之后，调停才奏效。

1564年，达赖五世显然过分夸张呼作“藏王”的衮玛阿王札失札巴逝世，因此，达赖三世再次被请出来调解纠纷，这次新的动乱发生了，西藏的天边再次出现乌云，为了继承，大衮玛的儿子（继承内邬栋王朝）同贡日噶波雪仲（*Zäbs druṅ*）阿旺札巴闹了起来。

帕木竹现在明确地分裂为两支：一支是内邬栋，仍然保持着衮玛的大头衔；另支是贡日噶波。两支的代表人物在达

赖五世所撰书中都不加区别地谈到了。帕竹家族的权力已经衰微，只不过留下一点痕迹，可是达赖五世的书中仍然把贡日噶波叫做藏王。

这个王的尊号现在已经是个虚名，其所以传留下来，不过由于僵硬迟钝的贵族们坚持他们古老的爵位而已，实际上除此以外，他们别无长物。但是，我们在上面已谈过，一个新的家族要求拥有这个藏王尊号而且还要求统治前后藏的实权；后藏的领袖仍然驻在仁蚌——这个绛曲坚赞的大臣们的后裔毁弃誓约叛变帕木竹巴的旧地。但这个家族已非昔比，从阿王札失札巴打败了他的叛乱的臣属的侵犯之后，这个家族已经意气沮丧，逐日衰颓。阿旺南杰(Nag dbaṅ rnam rgyal)之子，是个学者，又擅长辞章，被他的大臣之一，出身聂格(gñags)族的辛厦噶玛才旦(ñiṅ bśag Karma Ts'e brtan)废黜。达赖五世的王臣史对于这个勇敢豪迈的王朝的盛衰保持缄默，不言一字，这个王朝连根拔掉了帕木竹巴权力，威胁了黄教早期的幸运，变成红帽派的一支世俗的助力，坚韧机警地领导着后藏自卫，抵抗蒸蒸日上的前藏。

1565年噶玛才旦发动战争，他的儿子白玛喀波(Pad ma dkar po)辅助他，征服了桑主孜，桑主孜是内邬栋的领地，曾经一度封给穷结，嗣后给予仁蚌诸王，仁蚌诸王用武装守护它。桑主孜即今日的日喀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座落在一个肥沃的河谷中，控制汇合于此地的前后藏北部与雅鲁藏布江(即布拉马普图拉河)南北之间的各条大道，所以这个地方不但有很大的战略价值，而且因有一个繁荣的市场而收入丰厚。

桑主孜的失守不仅标志帕竹势力最后被排除出后藏，还



表示前藏更加暴露于后藏贵族们的侵略的兵锋之前。1575年,他们确实进攻藏绒(gTsañ roñ),陈兵于盖(sGal)并且在占领盖、绛(Byañ)和闷(sMon)之后进军机学在机学受阻,据达赖五世说,是泽当的沽尚(sKu žañ)衮桑孜(Kun bzañ rtse)唸咒把后藏的兵挡回去的(p.89a)。在同年1575年,我们还知道,锁南嘉错曾经调停红帽派同雅陇之争。

我们已经看到,以传记和宗教记述所写的军事事件为背景,件件记载无不反映出黄教与红教两个教派之间的互相戒备和互相怀疑的行动,它促使你争我夺,现在已经发展到争夺最高统治权的阶段。